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 东 主编

JOURNEY TO THE EAST

东方之旅

1579-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美」柏理安 著
毛瑞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东方之旅

1579-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美」柏理安 著
毛瑞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之旅:1579—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美) 柏理安
著;毛瑞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 Journey to the East

ISBN 978-7-214-19625-5

I. ①东… II. ①柏… ②毛… III. ①传教士—生平
事迹—西方国家—1579—1724 IV. ①B97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8151 号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By Liam Matthew Brocke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5-3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S00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书 名 东方之旅:1579—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著 者 (美)柏理安

译 者 毛瑞方

责任编辑 刘 艳

装帧设计 陈 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0.5 插页 4

字 数 39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9625-5

定 价 7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序 言

张西平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关于这方面的原始文献的整理出版、外文文献的翻译出版、研究著作的出版,一本接着一本;关于这一方面的博士论文一本接着一本,范围涉及之广,研究进展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摆在我案头的这本《东方之旅:1579—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算是翻译西方汉学界的一本新书。

据我看到的消息,目前的几篇西方汉学家的书评,对这本书的评价不高,多有微词,其核心观点是此书写作的框架基本上仍是传教学的范式,套路比较久,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究竟如何评价这本书,这涉及到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的转变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西方汉学家认为“在过去 25 年中,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范式变换。一般说来,这一变换是从传教学和欧洲中心论的范式转到汉学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式。”^①这种范式的转变导致了研究者的视角完全不同了,过去的传教学研究方式关注的是传教士的活

^① 钟鸣旦著,马琳译《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四期,第 478 页,大象出版社 1999 年。

动,他们如何传教,如何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他们在这传教活动的丰功伟业。显然,这是以传教士为中心的,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如果转变了研究的范式,不再以传教士为中心,那么“中国人如何接受基督或是西方科学?他们对传教士的态度如何?”这必然涉及反对基督教的研究。这样的转变使得过去极为重要的传教士活动的西文材料和文献不太重要了,反而中文文献开始变得重要了。这样的转变也带来研究者的变化,过去以教会内研究者或者以来华耶稣会士的西方文献为主的学者就要退场了,而汉学家们开始登场了。这个转变就是以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联手拿到一个欧洲重大项目开始的。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对欧洲汉学界的这种“汉学的转向”谈过看法。中国基督教史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段历史是中国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中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又是欧洲汉学史的一部分,我将其称为“传教士汉学”阶段。这样看待这段历史就会有不同的角度。从欧洲汉学演进的历史来看,它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明清之际的来华耶稣会研究作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其学术演进中也有着自身的特点。这正如西方汉学研究的其他题目一样。正像美国汉学家柯文不满意费正清在中国研究中的“冲击—反应式”的研究模式,提出了“从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模式一样,近年来提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模式转变的汉学家们大体也是这样的路数。

从西方汉学研究的历史看,这样的模式转变有其自身的理路和发展逻辑,在以往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史中对中文文献注意不够,对中国教徒研究不够,现在开始关注是合理的。但将这种模式搬到中国国内的明清之际的基督教史研究就有了问题,有两点值得讨论:

第一,在中国自身的明清之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传统中,对中文文献关注,对中国教徒关注,这样的视角,这样的模式一直是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和基本方法。读一下陈垣先生、方豪先生的著作就可以清楚看

出这一点。这样的研究方式在中国学术场从来不是新鲜的模式。第二,从中国自身的基督教史研究历史传统来看,所缺的不是中文文献而是西文文献,研究进展最为薄弱的是来华传教士的内部运作和各类传教修会整体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术界的传统传教学的研究恰恰弥补了对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空缺和不足。正是基于这一点,二十多年来,我致力于组织来华传教士西文文献的翻译。只要读一下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重要的学术论文,就可以看到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所翻译的西文的传教士的基础文献对推动国内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贡献。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对西方学术界以传教学方式研究来华传教士的重要文献和著作的翻译,^①今天的明清之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能否发展到今天?

从实际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天主教长期以来是以来华的传教士主导的,在晚清以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由中国本土神父主导教会发展是很晚的事情。因此,如果不从传教学展开深入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主要问题、基本线索都无法弄清楚。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本身仍写不出一本超越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教会的西文文献掌握不够,中国学术界真正从教会史角度展开研究的著作也不多。在这个意义上,认真翻译西方学术界以传教学方式研究的著作,对中国学术界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东方之旅:1579—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这本书给予肯定。这是一本在传教学模式下的研究著作,它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有三个贡献:

① 高华士著 赵殿红译《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年;(法)伊夫斯·德·托马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著 辛岩译,《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大象出版社,2004年;(德)柯兰霓著 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大象出版社,2004年;(丹麦)龙伯格著 李真 骆洁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年;(美)魏若望著 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4年;(法)杜赫德编 郑德弟等译《耶稣会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年;(法)李明 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大象出版社,2005年。

第一,作者所依据的历史文献十分珍贵。这部书主要文献来自于《耶稣会在亚洲》(*Jesuítas na ásia*),这套档案文献原藏于葡萄牙的阿儒达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它是从1549年沙勿略到达日本后西方传教士在远东传教活动的真实原始记录。全部档案共61卷,均为手抄本,计三万页。文献以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及法文写成。

这批文献最早是由葡萄牙耶稣会神甫若瑟·门丹哈(José Montanda)和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Álvares)修士等于1742—1748年对保存在澳门的日本教省档案室的各个教区整理而成的。在这些教区中包括中国的副省北京、广州、南京以及交趾支那、老挝、柬埔寨等地。他们将些原始文献加以分类,整理和编目,最后抄录,形成这批档案。

这批文献是研究中国明清代天主教史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清代社会史的最重要的一手文献,它包括向耶稣会总会的年报告表;教区内的通信;发生在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的伦理学和神学的争论;宗座代牧与罗马传信部争论的报导;耶稣会殉难者列传;澳门、日本和中国教区的主教和各省会长记载;航行于澳门和日本之间的黑船所载运货的货物表;澳门及各省会修会的财产清单;传教士之间的通信等。这些文献不仅给我们提供明清基督教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同时也记录了明清两朝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在中文文献是不记载的。这套文献,以往的研究中引用较少,至少不像这部书这样,其基本史料是立足这套文献写成的。

第二,以往研究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以个人研究的较多,这部书是按照来华传教士入华的年代展开的,全书并不聚焦个人,而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展开了明清基督教的研究。这一方面给作者带来了一些困难,同时也披露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例如在1644年,耶稣会的北方几个住院有记录的信徒188人;清初历狱的裁决是“元凶和钦天监的中国副手被处于死刑,放逐其他洋人,并笞以四十大鞭作为旅费”。这样的历史细节很多;其他研究著作由于集中在一个人,对众多耶稣会士活动的记载关

注不够,这本书涉及到了很多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有些传教士过去很少提到,如费奇规(Gaspard Ferreria)、费乐德(Rodrigo de Figueiredo)、王以仁(Pieter Van Hamme)、方德望(Etienne Faber)等等。

第三,对在华耶稣会活动的内部结构做了较为详细地介绍。书中从传教士来华前的教育、来华历程到来华后的汉语学习、传教方法训练都有详细的介绍。在孟德卫(D. E. Mungello)的《神奇的土地》中对传教士如何利用《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本书展开汉语学习也曾做过介绍,而此书在这点上展开的更为丰富。书中还介绍了耶稣会的汉语学习的“教育计划书”。在这个计划书中,传教士们“每学年有两个学期,每天有两节课,一个礼拜六天课。在一天里学生们上午学习一个小时,下午学习四十五分钟,每天都要背诵”。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专家汤开建先生对此这样评价,他说:“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从耶稣会传教团内部的角度出发,对耶稣会来华史展开研究,而非定位在耶稣会与欧洲或中国环境的互动影响上。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必然会带来与传统传教史学、文化交流或中国史中心研究不同的见解和内容。”(IV)

平心而论,这部著作由于过多依赖于《耶稣会在亚洲》这份文献,自然在文献上也有不足,因为《耶稣会在亚洲》主要记载了葡萄牙护教权时期来华耶稣会时期的活动档案,而随着法国耶稣会士的来华,大量的来华耶稣会活动的文献已经转移到了法国,这样自然这部书有较多的葡萄牙色彩。同时,由于在传教学模式展开,全书也无法反映出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互动,这是令一些学者不认同的主要原因。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来说,目前传教学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不够。大量的基础数字,重要的历史事件至今仍没有完全研究,根本原因是西文文献的发掘不够。对中国学术界来说,那些汉语较好,以汉文献为主展开研究的汉学家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尽管对我们有启发,但随着中文文献的大批涌现,在中文文献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研究的进展,表明现在中国学者已经成为研究主体,其水平已经开始超过这些汉学家了。且不说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如张先清、肖清河,

只要看看黄一农先生和汤开建先生的著作就会知道,这些著作已经大大超过了西方汉学家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在汉文文献研究上,依赖西方汉学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而,中国学术界目前所缺的以西文文献研究为主体的西方学者的成果,如比利时学者高华士。只要读一下去年刚出版的他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后在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史》一书,就知道我们多么需要这类的西方学者。在这个意义上,《东方之旅:1579—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尽管有些不足,但所展开的内容对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仍有价值。

如果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来说,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无论采取那种模式研究都是有不足的,因为,这段历史的双重性被完全忽略了,这段历史并非仅仅是“西学东渐”,同时也是“中学西传”。特别奇妙之处在于,这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学术活动都是由来华的传教士们所承担的,而且这两件事本身是内在的、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如果将这段历史仅仅压缩为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将重点放在中国教徒的研究,中国文人对西方文化的接收研究,显然这样的“汉学转向”研究模式,曲解了这个历史的全貌,而且最终无法做好中国基督教史。例如,礼仪之争这个根本性事件,尽管中国信徒的声音是重要一面,但如果仅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显然抓不住礼仪之争的核心,因为,这件事从本质上是欧洲教会史和欧洲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汉学家提出的“从传教学和欧洲中心论的范式转到汉学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式”仍未抓住这段历史的要害。不仅如此,这样的研究范式如果被中国学术界所接收,那就是一种误导,其结果就是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也开始大大压缩了中国学者对这段复杂历史认识的空间。我一直认为,将来华传教士的活动仅仅作为中国基督教史来研究是不全面的,从西方汉学史的角度来说,这是其形成的“传教士汉学阶段”。传教士在中国期间所写下的中文著作和西文著作,这批文献既是中国基督教史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汉学的“传教士汉学”的一部分,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欧洲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交错的文化史,单纯

的欧洲中心和中国中心都无法真正揭开这段历史之谜。这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由于所选的研究视角不同，自然产生的结果也不同。而只有从全球史的角度来把握这段历史，才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张西平

2016年8月1日写于北京岳各庄游心书屋

前 言

本书缘起于一个旅行,随后各个章节叙述的一系列的传教士故事也跟旅行有关。四百年前的传教士以中国和东方文化为目标,而本书则以西方的传教士为研究对象。1996年,我参观了北京古观象台。伫立在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雕塑前,我开始对当年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产生兴趣,但是,当时我并不清楚将来会研究些什么。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几周,我刚刚参观过澳门圣保罗大教堂遗址,当时还没有将这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直到几年以后,我才在葡萄牙决定研究曾经到东亚传教的传教士。当时我决定开始研究利玛窦和他同事的事迹并非偶然,因为在此前几年,我已很留意在各地搜集更多和他们的故事有关的史料。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在此表达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菲利普·本科特(Philip Benedict)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完成初稿。戴奥·科图(Diogo Curto)和贾祖麟(Jerome Grieder)也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我的同事陈慧宏(Huihung Chen)、亨瑞克·莱涛(Henrique Leiao)和约书亚·泽兹(Joshua Zeits)也都在本书成稿初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还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几位同事的帮助,非常感谢彼得·布朗(Peter Brown)、鲍勃·达恩顿(Bob Darnton)、尼古拉·D·科兹摩(Nicola Di Cosmo)、本·埃尔玛

(Ben Elman)、托尼·格拉夫顿(Tony Grafton)、马丁·海德拉(Martin Heijdra)、比尔·约旦(Bill Jordan)、彼特·雷克(Peter Lake)、菲利普·摩根(Philip Morgan)、韩苏瑞(Sue Naquin)、威拉德·彼得森(Willard Peterson)、泰得·莱博(Ted Rabb)和彼得·斯沃(Peter Silver),感谢他们的深刻见解和持续鼓励。另外,一些世界各地的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像杜鼎克(Ad Dudink)、高华士(Noël Golver)、夏伯嘉(Ronnie Hsia)、汤姆·麦柯国(Tom McCoog)、梅欧金(Eugenio Menegon)、肯·密尔斯(Ken Mills)、约翰·拉塞尔伍德(John Russel-Wood)、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和伊恩斯·祖潘诺(Ines Županov)诸位先生。我还要特别感谢我最好的朋友吉尔吉斯·埃里森那斯(Jurgis Elisinās),虽然,他待人非常热情,但在学术上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正是他在我每完成一部分草稿后都认真校读,不断地修订我的写作和论述,非常感谢我的这位朋友。

这些年,我也与无数耐心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保管员打过交道。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一位是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的孔塞桑·吉达(Dra. Conceicao Geadá),另一位是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托马斯·热迪(Tomas Reddy)神父。没有孔塞桑的帮助,我恐怕不能如此快就看到耶稣会士的相关资料。没有热迪神父的慷慨解囊和热心帮助,我肯定也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在罗马的调研。当然,如果没有基金会的资助,上面提及的两个调研也许压根就不会成行,因此,感谢澳门文化局和富布来特项目提供的资金,供我到葡萄牙和意大利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同样,感谢普林斯顿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委员会提供的系列资助基金。我还要特别感谢 Luís dos Santos Ferro 和葡美发展基金会(Fundação Luso-Americana para o Desenvolvimento)为我的研究提供大力支持。

数年如一日地钻研一项研究课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葡萄牙,如果没有家人的大力支持,我可能无法将这个研究坚持下来。我的妻子莫妮卡(Mónica)是最认真和最具鉴别力的编辑,从初

稿到最终的定稿，她都认真地校读过，没有放过任何一行文字。有她和我们的孩子们，贝亚特里斯(Beatriz)和利奥诺拉(Leonor)的陪伴，我的这次研究和写作之旅是幸福的。唯一遗憾的，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岳母——玛丽(Maria do Céu)还未及看见本书出版就驾鹤西去。正是在她的房子里，我欣赏着窗外里斯本天空下的美景，学习葡萄牙语、写出这部书稿。在那个赋有灵感的地方，我仿佛能够看到在蓝色的、银河般的塔霍河，那个印度公司的船队曾经停泊过的海港上，又有一支印度船队在等待启航，开始他们的东方之旅。